

重奖见义勇为为当扬善风向标

10月22日下午,广州市委副书记、市纪委书记、市综治委副主任苏志佳代表市委、市政府,前往市公安局水上分局东河道派出所,亲切慰问了19日晚上跳江救人英雄牛作涛的家属,并送上见义勇为荣誉证书和30万元慰问金。

苏志佳郑重承诺,如果牛作涛的妻女愿意到广州工作学习,市委、市政府一定予以解决。(10月23日《广州日报》) 退伍军人工勇救落水女子壮烈牺牲的感人一幕,表明在当今社会,“见死不救”并非是一种常态,道德依然活在人们的心中,见义勇为仍然拥有执著的坚守者。

广州30元重奖救人英雄,并承诺解决其妻女工作、学习问题,是对牛作涛见义勇为最好的褒扬。通过“奖善”,激励和倡导见义勇为,广州之举不应成为个案,而应该成为引领全国的一个风向标。

见义勇为者,有的因此受伤致残,给其今后的人生带来困难,甚至要比健康人付出多倍的精力;有的甚至献出了宝贵生命,给亲人和家庭带来难以承受的痛苦。见义勇为者的壮举感动天地,值得颂扬,但他们做出的巨大牺牲,更需要给予法律救济和制度抚慰。

因此,广州拟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见义勇为人员权益保护的措施》,建立奖善机制,以此激励见义勇为,也是一项善举。

一个社会要形成稳定的道德秩序,营造良好的社会风气,不仅要有强有力的社会舆论监督,而且要求每个社会成员的自律。然而,当被救助者丧失了诚信和良知,还理直气壮地去伤害行善者时,受伤的行善者却显得孤立无助,处在被动挨打的位置,为自证清白伤神费力,社会的隔膜和冷漠就会在这里埋下种子。

退伍军人工勇救落水女子,闪耀着人性的光辉,但这种善举不能成为“个唱”,而应引起人们的共鸣。若想舍己救人成为全社会的大合唱,需要奖善机制去激活。也就是说,对于见义勇为者,既要给予法律救济,更要给予制度关怀。

首先,法律应彰显“惩恶扬善”的正义力量,司法机关要根据事实真相,支持行善者拿起法律武器替自己维权,将讹诈行善者的被救助者推上被告席,接受法律和道德的双重审判。维护行善者的合法权益,就是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这是对助人乐为、见义勇为的一种褒扬,更是对诚信社会的一种引领。

更重要的是,当今社会,人们见义勇为时常面临这样和那样的顾虑,迫切需要有有关部门通过政策奖励去进行正面引导和示范,倡导“人人尊重见义勇为,人人保护见义勇为,人人敢于见义勇为”的良好社会风尚。当然,奖励见义勇为,不在金钱和物质的多少,关键是要让“奖善”制度化,制定具体化、规范化的奖善措施,以此激励更多人去见义勇为。

“不让英雄流血又流泪”,这是社会对见义勇为者最好的褒扬。因此,我们不能仅限于给见义勇为者法律救济,不能仅限于给见义勇为者一个荣誉称号,而要运用救助、奖善机制,去帮助他们规划未来,为他们的工作和生活铺就阳光和关爱的坦途。让见义勇为者真正“善有善报”,有体面地劳动,有尊严地生活。

西流

请以商业理性终结『拍砖』式互伤

中国商家之间的非理性商业经营纠纷似有愈演愈烈之势。有乳业巨头蒙牛的高管涉嫌诬陷伊利产品,双方陷入互相攻讦;有饮用水企业康师傅和农夫山泉持续多年的“水之战”,结果让消费者对各种水源质量都疑重重。前两天,淘宝纠纷再起波澜:在淘宝方面宣布推迟商城老客户执行新规后,部分中小卖家集体转向支付宝提现,被指为“扰乱金融秩序,涉嫌严重违法”。

我们可以把淘宝商城和中小卖家的纠纷看成是电子商务“成长的烦恼”。其所涉的诸多命题,比如平台企业和商家的利益均衡机制、相关法律法规建设等,都是电子商务发展必然碰到的“瓶颈”。商务部的介入或让人有理由相信,漏洞会在纷争之后补漏,以维护电子商务发展的蓬勃之势,但电子商务企业自身也应切忌采取那些非理性、非法且恶性的竞争手段。

在目前淘宝纷争中,当事双方显然缺乏应有的商业理性。中小卖家接到涨价通知,采取的是“拍砖”式维权方式;而马云身为电子商务领袖,能熟练运用国际规则与雅虎这样的巨头周旋,却扑不灭自家后院“草根们”的火,让人不能不为电子商务的未来捏一把汗。

不单是企业家,消费者的非理性维权在我国商业活动中也不鲜见。时常在各地上演“砸车事件”就是此类“暴力维权”的代表作。只是,这种方式在快意之后,留下一地废墟,并未给商业文明的建设添加些许砖瓦。

商业博弈或许表现为你死我活、波谲云诡,但究其本质,是契约精神下的生产、流通和消费各个环节的多赢、商家、中介、消费者的关系更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契约的意义在于,它以大家共同认可的规则,将各方利益捆绑在一起,并由此降低了交易成本。商业模式可以根据形势随时调整,但诚信守则、共同繁荣始终为商业持续发展的根本。

消费者以及小微企业的“拍砖”式暴力维权,往往是由于与强势企业相较实力悬殊,缺乏议价渠道和维权的可操作性。因此,要让企业、商家与消费者遵循商业理性行事,不仅要靠法律法规的完善、主管部门的协调监管和局部的妥协,还要培育强有力的小微企业行业组织、壮大消费者协会组织,让各方利益可以在平等合法的基础上通过协商达到平衡。

据说,创造新的商业文明是马云们一直以来的理想。然而淘宝纷争让人们看到,新的科技手段并不必然地催生新的商业文明。在“拍砖”式商业纠纷频现时,各方都有必要重温那些最基本的商业伦理,才能降低商业运营成本,维护商业信誉,更捍卫消费者的基本权益,也一扫中国商业在国际形象上的阴霾……

任语

希望“好人网”盼得好人多起来

据新华每日电讯报道,52岁的谈方是华南师范大学教授。教书之外,他用上了几乎全部的精力去做一件与“教授”无关的事情:创办“中国好人网”,帮助生活陷入困境的好人,让他们获得好的回报。

三年来,谈方自己出资十几万元成立“好人基金”,寻找为汶川地震捐款的人,帮助见义勇者为后贫病交加的英雄、为车祸受害的救交志愿者还清债务……谈方坚信:好人受到尊重,就有越来越多的人做好事。

“好人有好报”,这是谈方一直坚持的信念,也是他所要努力传递给别人的观念。而他认为,“好人有好报”必须做出来才有人相信。

面对目前我国频繁出现的老人跌倒怕人讹没人扶,儿童遭车祸生命垂危没人救,食品安全总让人不安全感等一系列道德缺陷问题,现已被国人所重点关注。

被关注就是好事,说明人人有同情心,是必须解决的社会问题。然而,社会问题又往往牵扯到个人问题,这是存在因果关系的。负面的东西一旦存在,而且逐渐增多,说明“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改革开放30多年来,钱和经济已把人摆在重要日程,甚至夜里睡觉时还想着如何去挣钱。唯有道德的问题屡屡被人所忽略,直至道德失去底线时,人们方才从恍惚中醒来,原来道德是不可缺少的。道德不仅是人的品质问题,它更牵涉到文化的渗透,社会环境的影响。

之所以老人跌倒没人扶,儿童遭车祸没人相救,食品安全失去了良心,关键在于没有全国上上下下的信用体系,没有德成的法律体系作保障。即便食品安全多部门监管,也是“铁路警察各管一段”,甚至各自设置壁垒,信息不能互通。

至于见义勇为的道德机制更是缺乏,根本没有可以依靠的部门解决实际问题。政府部门没有主动担当社会职能的部门,才出现了像谈方教授这样的民间人士出手相助,期望好人有好报。问题是建立“中国好人网”本应是政府的担当,却无意中落在了谈教授身上。这让国人情何以堪?

不过,好在国务院总理温家宝19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制订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指出当前社会诚信缺失问题依然相当突出,商业欺诈、制假售假、虚报冒领、学术不端等现象屡禁不止,人民群众十分不满。各级人民政府要高度重视社会诚信和信用体系建设,通过完善制度、加强教育,努力营造诚实、自律、守

信、互信的社会信用环境,使诚实守信者得到保护、作假失信者受到惩戒,为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改革和发展提供良好的道德保障。

我们真诚希望“好人网”能盼得好人多,在不久的将来切实建设好社会信用体系,奖励和惩戒都有具体的部门担当责任,绝不让群众遇事投靠无门。同时,国家做出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能否建设好,真正考验的是政府部门是否建立了让群众信任的信用体系。

建立社会信用体系,更应注重社会教育,人文关怀,以及加大对道德信用体系建设的宣传力度,把奖励激励机制摆在重要位置,让人普遍向好,真正让人的思想发生好的变化,让道德实现回归,让人们对社会道德看到新的希望,看到道德在向所有人招手致意。

郭喜林



德与法

文文绘

平抑菜价不仅要靠多种菜

运菜车总有空驶的里程,“绿色通道”不能仅针对满载蔬菜的车辆。

据报道,北京市周边500公里之内,将每年新增蔬菜生产基地4万亩,专供北京市市场,保证3至4小时内新鲜蔬菜到市内。北京市农委相关负责人表示,这些基地对北京的蔬菜储备起到了保障作用,同时客观上会平抑菜价。

时下,北京市蔬菜自给率不足30%,蔬菜供给主要还是依赖外埠调入。因此,有计划、有目的地扩大周边地区的蔬菜种植面积,不失为一个缓解本市“菜篮子”紧张情势的良方。不过,若想真正平抑

菜价,并不能止于多种菜。目前北京周边一些地方的蔬菜种植面积并不小,仅河北张家口市今年就种植蔬菜130万亩,对于北京这样一个庞大、稳定的蔬菜市场而言,周边地区的蔬菜生产面积只会不断扩大。

真正应该考虑的,应该是如何让周边这些地区的蔬菜顺畅地进入北京、再进入千家万户。比如说,外埠运菜进京车辆能否享受更具体的优先、优惠政策?北京市此前规定,运菜进京可以享受“绿色通道”,但是,那仅仅是针对满载蔬菜的车辆,空车

不在此列。可问题是,运菜车总有空驶的里程,不然如何装载蔬菜?再比如,一车蔬菜进京,一般要经过产地批售、城里批发等多个环节,这样必然使得最终的蔬菜价格很难体现到菜农身上,因此是不是可以与重要蔬菜产区合作,在北京开更多的外地蔬菜直营店。

此外,应该探讨尽量放松对流动菜贩的管制,让更多的市民在更多的时候能够在家门口买到蔬菜,这样,既还市民以便利,也给一部分低端就业人群以生路,还平抑了菜价,这样的事情才是真正的民生工程。

城市不能只是“种菜”,还要种菜,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一方面,应该持续巩固蔬菜的自给率,不能让越来越蔓延的城市将郊区菜地蚕食殆尽;另一方面,也应该积极探索更高效的蔬菜产业,提高蔬菜的自给率。在这方面,北京市可以参照一下上海的做法,央视报道,上海市蔬菜自给率为55%,为全国城市之冠。

平抑菜价既要依靠千里之外、百里之外的外埠蔬菜救急;也要不断提高本埠蔬菜自给率;更要切实改进城市管理,让这进道而来的蔬菜顺畅地走完“最后一公里”。

文斌

新招



质文绘

政府重教缘何让人『想不到』

县委、县政府至今在上个世纪70年代建的老房子里办公,书记、县长都“蜗居”在只要进去3个人就转不过身来的狭小空间里办公。原来,2007年以来,该县财政收入大部分投入教育,先后建成44所农村中小学标准化学校,即使县里最偏远的农村学校,其教学条件也和城里一样。在云南嵩明县走访的《中国青年报》记者为此连呼“想不到”。

正如“再穷不能穷教育”的世俗俗语所言,像云南嵩明县这样竭尽所能地优先发展教育,本来就是地方政府应有的作为,但官衙“蜗居”、学校敞明的现象缘何让人“想不到”?

如是“想不到”,与我们具体的社会经验密不可分。古语说“官不修衙门,客不修店”,但在现实中,我们耳闻目睹的其实是另一面:一些地方政府不惜斥巨资建设豪华办公大楼。这种情形愈演愈烈之下,不仅星级办公楼层出不穷,而且不断涌现出诸如“白宫”式、天安门式等极具象征性况味的办公楼。这种攀比之风甚至在个别国家级贫困县也屡禁不止。

习惯了耳闻目睹此等现象,面对云南嵩明县的这一状况连呼“想不到”,也就不难理解。而回归常识的举动竟被视为不可多得的壮举,也正映射了当下的教育发展面临的尴尬。

这种尴尬缘何而来?云南嵩明县人士的一句话让人印象深刻,他总结当地的经验是,“像发展经济一样重视教育。”侧面解读这句话,它的另一面其实是:发展经济才是第一位的。在某种程度上说,不少官员都有这样的认识:政府办公大楼被视为招商引资的“形象”,发展教育则被视为“纯投入”甚至是“浪费钱”。这无疑是本末倒置。

而更可怕的是,这一功利性发展思路的普遍性存在,不仅导致了各地的教育发展不均衡问题高度相似,而且使得个别极端所能优先发展教育的地方政府倍感“被孤立”。报载,国家级贫困县陕西平利率先在全国贫困地区实现学前到高中15年免费教育,政府免费提供办公楼建学校。不过,虽然舆论对平利好评如潮,但平利的官员却感到“格外不安”,担心其他地方的政府官员会因此不看“会不会让他们尴尬,进而对我们平利产生看法?”

但愿嵩明的官员们赢得的是掌声,而不是冷嘲热讽。这样,我们的教育才会有希望。

念军

能赚钱并不是公众评价央企的最重要指标,石油巨头应当去努力提高自己在社会责任榜单上的排名。

国资委发布了《央企2010年度分户国有资产运营情况表》,120家央企中102家央企经营情况显示,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以净利润1241.8亿元成为“最赚钱央企”,中移动、中海油、中石化的净利润则紧随其后。

这样一份金光闪闪的成绩单,其实不算新闻,身为全球市值最大企业的中石油,曾多次蝉联“亚洲最赚钱公司”宝座,其他两大石油巨头也不甘落后。2010年,中石油、中石化和中海油三家石油巨头共实现净利润2705.4亿元,比上年增长47%。换算一下,在102家央企里,“三桶油”的净利润就要占到央企总利润的32%。

但是,这样油光发亮的利润数字,石油巨头们其实并不满足。“国内成品油涨幅滞后,炼油和天然气进口的政策性亏损大拖累了上半年的业绩”,这是中石油今年半年报中的一句话;其实,类似油价倒挂、炼油亏损这样的政策性亏损托辞,早就成了石油巨头们的口头禅。

可是,面对石油巨头的暴利,公众却有一种强烈的被剥夺感,因为石油巨头们的主要利润来源,肯定不是开拓国际市场赚老外的钱,而恰恰是压在国内消费者身上的沉重的高油价。不仅是高油价,石油巨头的暴利,还对应着日常消费品中必不可少的物流成本上涨,变成物价高企的间接推手。除此之外,在石油巨头们的巨额利润中,公众又得到哪些实际好处呢?国资委原掌门人李荣融说,“任何出资人、任何股东,都需要回报,这是常识。”但是,这个“常识”对“全民股东”而言尚未成立。

国资委报告称,石油巨头们的业绩,归功于三家企业加强生产经营管理,积极开拓国际市场,2010年国际油价持续走高更使其收益大幅提高。但是,这里面公众真正认同的,恐怕还是油价暴涨这一条。此前,每当石油巨头要求油价上涨时,往往都会使用“油荒”来逼宫;现在,国内油价刚一下调,国际油价却在上涨,石油巨头又要出了这一招。自8日下调油价以来,江苏、浙江、山东、安徽等多地的加油站即出现限购柴油或无油可加的现象。

由于石油巨头的限售政策,目前全国44005家民营加油站中,过万加油站面临柴油断油问题。可是,中石化官员却表示,“民营加油站是企业,中石化也是企业,我们要保障市场供应的,没有保证民营加油站的责任。”石油巨头以“保障国计民生”的名义享有垄断的特权,却不愿承担央企应有的社会责任,纯粹以等同于民企的利润最大化作为追求——这样的央企利润当然不是越多越好。

石油巨头在追求利润之外,应当去努力提高自己在社会责任榜单上的排名。要知道,能赚钱并不是公众评价央企好坏的最重要指标,能承担社会责任才是公众对于央企的最大期盼。

石油巨头除了赚钱更要有社会责任

不是没有办法 而是要不要办法

日前,香港媒体团探访广东输港生活必需品供应及粤港澳合作项目活动圆满结束。为期三天的活动透露出一个喜讯:为确保供港物资的质量和数量,广东各级检验检疫部门和生产基地在各个环节严格把关,实行标准化生产,供港食品连续16年没有出现严重的食品安全事件,合格率一直保持在99.98%以上。(10月23日《南方日报》)

在内地食品安全事件层出不穷的背景下,同样产于内地,供港食品连续16年没有出现严重食品安全事件,确乎是一个喜讯。所以,就此事件不妨同时盘点一番我们的“成功做法”。

首先,确保食品安全不能仅仅依赖于法律升级,更需要严格执法。在供港食品的16年中,我们经历了《食品卫生法》升级为《食品安全法》的过程,事实证明,无论是在《食品卫生法》的框架之内,还是在《食品安全法》的规制之下,供港食品都没有出现问题。由此可以再次重复一个简单的道理:徒法不可以自行。法规制度再峻厉,不能落到实处,也不过是唬人的“稻草人”。

其次,法制框架之外,更需要监管的制度创新。围绕供港食品安全,有关部门可谓煞费苦心,譬如广东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实施了农产品从“田间地头”到“餐桌”的全过程监管,对所有供港澳食品、农产品原料养殖基地实施注册备案制度;2008年,广东全面启动供港活猪电子耳标标识管理,开创了将射频识别技术用于食用动物安全卫生质量控制的先例。恰恰是这些监管的制度创新,为供港食品安全提供了保证。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保证食品安全,我们不是没有办法,而是要不要办法。

再者,治理食品安全问题,是一个相互配套的系统工程。从供港食品安全措施上看,生产监管、原料注册备案、安全溯源体系、运输方式、出入境“食品风险预警网络报告体系”,一应俱全。正是在这样一个互动而周密的体系下,即使对供港食品同样采取抽检手段,也可以保证质量安全。也就是说,之于食品安全,一定程度上单兵突进的严查严管,效果或许并不明显,互动而周密的保证体系,才是至关重要的,这个体系,可以弥补某一项制度本身存在的不足。

再好的经验如果不能落到实处,也不过是纸上谈兵。所以,保证食品安全,归根结底在于有关部门的态度。能不能在对内地食品安全上,同样煞费苦心。从供港食品16年合格率保持在99.98%以上的事实看,从敢于邀请香港媒体团实地探访的底气看,我们有能力保证食品安全。或许,关键在于有关部门做与不做,或者是雷声大雨点小地做,还是周密而负责任地做。如果做不到内地食品安全,那么供港食品越安全,对有关部门越是一种羞辱。

燕农